

民族团结誓词碑： 各民族信念相同的历史见证

□ 杨鸿春 马艳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坐落于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民族团结园内，由26个民族的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共同立下，旨在表达各族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到底的决心。它是新中国各民族信念相同的历史见证，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

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割据和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边疆地区敌我问题、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维护民族团结是一项伟大而艰辛的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仍然十分复杂，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云南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较深，少数民族中较先进的民族和山区其他民族存有裂痕，民族内部部落之间也有矛盾，有的地方经常发生仇杀械斗。

1950年，中央决定，从各地兄弟民族中选派代表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盛典，以增进边疆人民对内地的了解和民族团结。大多数民族代表就是其所属民族的头人。由于当时云南解放不久，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了解不深，这些人对被选派为代表外出参加活动抱有顾虑，有的不愿前往北京。

为体现政府诚意，对于一些合理要求，普洱专区行署都尽力满

足。拉勐是当时普洱地区很有影响的佤族头人，曾带领大家抗日剿匪。普洱专区工作组反复做拉勐的工作，请他出面带头赴京。拉勐最终被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真诚所感动，接受邀请，组成普洱区赴京观礼民族代表团。当拉勐带领少数民族代表冒着酷暑、躲过残匪骚扰赶到昆明时，已是195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派出最好的军用飞机和驾驶员，将35位少数民族代表从昆明接到重庆，并于次日送抵北京。国庆大典当天，来自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代表站在观礼团中，亲眼见证了激动人心的时刻。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少数民族观礼团回到云南，拉勐没有回家，他先去参加普洱专区的民族团结代表会。会上，党政军领导认真征集每个代表的意见，希望提出促进民族团结的好方法。拉勐与另一位佤族头人李保当即提出：为了各民族永远团结不变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应按佤族习俗搞一次盟誓！此提议立即得到会议组织者、时任中共普洱地委书记张钧的大力支持。他们当即开会决定在普洱举行盟誓仪式，所有代表公推拉勐作为剃牛手。在中国民间，盟誓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种信用凭证，是在神灵崇拜文化下的自我约束机制。当人们面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项或纠纷时，参与盟誓者通过直面神灵的方式，与他者建立

一种坚固的信用关系。

1951年元旦，3000多名群众参加在宁洱红场举行的民族团结盟誓大会，来自普洱地区15个县，包括各民族支系在内的26个兄弟民族欢聚一堂。按照佤族重大祭典的习俗，喝鸡血、剽牛。仪式开始后，拉勐一剽击中牛的要害，剽口朝上，牛头倒向南方，完全符合人们的期望。在场的佤族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

普洱党政军领导与所有民族代表共同商议刻石立碑，各族代表共48人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用汉文、傣文、拉祜文签上自己的名字。民族团结誓词及签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碑文誓词如下：“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剃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此举在当时复杂的边疆斗争形势下，需要极大勇气。因为盘踞在边境的国民党残余势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日益猖獗，经常流窜到境内搞恐怖活动。在誓词碑上签名，意味着有可能受到生命威胁。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及其精神的鼓舞下，当年参加立誓的党政军领导和各民族代表经受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生命，但始终没有一人背叛自己的神圣誓言。誓词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

维护民族团结无私奉献。

誓词碑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也是对未来的期盼，象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建平等自由幸福国家的决心和承诺。民族团结誓词碑自1951年立碑以来，每年都有大量各族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学习，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民族团结誓词碑体现了普洱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和爱国爱国的坚定信念、一诺千金的高贵品质和同舟共济的崇高精神，表达了一心一意跟党走、坚如磐石的铮铮誓言。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普洱各民族兄弟秉承和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心一德跟党走”的不朽誓言和同心永结的豪迈情怀，围绕“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目标，开创了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纪元，呈现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边疆安宁、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经济腾飞的和谐景象。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正如一粒粒“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誓词碑正是边疆民族群众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历史见证，是集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民族团结教育为一体的鲜活教科书，是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成功案例，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真实写照。



江苏省宿迁烈士陵园属于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宿北大战马陵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就坐落在这个陵园内，建于1963年，塔高33.12米，塔的正面镌刻着陈毅题写的“宿北大战马陵山革命烈士纪念馆”14个大字，纪念馆西侧建有一座护碑亭。2021年12月，宿北大战胜利75周年之际，在纪念馆西侧、护碑亭南北两侧建成宿北大战烈士纪念碑廊，碑廊内的青石碑上刻有《宿北战役烈士英名廊碑记》，全文如下：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冬，我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命，合力遂行宿北战役。

宿北战役，四海震惊，举世闻名。国民党精锐部队凭借美式装备，气势汹汹，扬言消灭共军于苏北，结束苏北战事。我军民在陈毅、粟裕共同指挥下，上下同心，斗志昂扬，力克顽敌，取得了整个爱国自卫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以全歼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和三个半旅计二万一千余人的光辉战绩而彪炳史册。

是役，我军亦伤亡八千七百余人，其中阵亡二千一百九十一人。值宿北战役胜利七十五周年之际，置烈士英名廊，录烈士英名一千八百五十二名，以缅先烈，砺今人，更昭来者。

宿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碑文以精练的语言概述了宿北战役发生的时间背景和作战经过，高度评价了宿北战役的重大历史意义，表达了战役发生地人民对人民军队和革命英烈的崇高敬意。敬读碑文，深受教育，催人奋进。

“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

1946年11月15日，伪“国民大会”开幕后，蒋介石为了取得军事上的配合，给“国大”代表打气，在华东地区调集了25个半旅的兵力，组成盐阜兵团、涟淮兵团、宿迁兵团、峰陵兵团，分四路向我鲁南、苏北解放区进攻，企图切断我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的联系，实行各个击破以便“迅速结束苏北战事”。

面对敌人四路进攻的严峻形势，陈毅、粟裕等经过分析敌我态势后，下定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先攻打宿迁之敌，并以敌整编第69师为首歼目标，力求歼敌于运动之中。即以24个团的兵力，首先围歼敌第69师于宿迁、沭阳、新安镇（今新沂市）三角地区。然后视战况发展，如有可能，再转移兵力会同北上的我第1师（8个团）歼灭敌整编第11师。同时，以28个团的兵力分别监视和阻击其他三路敌人。

战役从12月13日打响，至12月19日结束。战役过程中，我军采取东西夹击、穿插分割、四面包围、逐个消灭的战略战术，把敌第69师和第11师分割成两大块，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又把首歼之敌第69师分割成四小块实施逐点攻击，最后围歼第69师师部于人和圩。经过七昼夜的浴血奋战，我军全歼国民党整编第69师3个半旅，共计2.1万余人，师长戴之奇自杀身亡，副师长饶少伟被俘。同时，重创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战役结束后，陈毅赋诗称赞道：“敌到运河曲，聚歼又何疑？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十分形象地描绘出宿北战役的过程和胜局。

“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

宿北战役是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会合后共同作战的第一仗，以全歼国民党整编师的辉煌战绩而载入解放战争史册。此役为我华中、山东野战军统一编为华东野战军和此后华东战场的集中统一指挥，对敌进行大规模的歼灭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宿北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蒋介石

胜利实现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标志

——宿北战役烈士英名廊碑文敬读

□ 李平军

石集团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战斗士气，对整个华东战场乃至全国战局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在延安代中央军委先后两次发去贺电指出，“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歼敌二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蒋介石孤注一掷的失败》，指出宿北大捷是“苏皖解放区超过以前十一次大捷的空前的大胜利，也是今年七月以来整个爱国自卫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对于今后的战局，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粟裕在回忆录中将此次战役称为“胜利实现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标志”。

兵民是胜利之本

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宿北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战役中，我军伤亡8700余人，其中牺牲2191人，目前能够查实姓名的烈士有1852人，仍有339名烈士不能确定姓名。战役过程中涌现出许多英雄群体和个人，俞慕耕和他率领的部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俞慕耕时任我军第1纵队3旅9团参谋长，12月16日，他奉命率2营大胆挺进敌后，歼灭曹家集外围敌兵营和骑兵营大部，击溃炮兵连，并一举突入曹庄敌整编第11师指挥所附近，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后由于敌重兵反扑，陷入重围。在指挥部队突围过程中，俞慕耕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命令身边警卫员取下他的公文包和短枪，火速撤离阵地。俞慕耕牺牲时年仅30岁。此次战斗中，3旅9团2营4连、6连除40余人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

宿北战役也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战役期间，在华中北线支前司令部和鲁南、滨海地区党政军组织领导，先后动员民工达41万人参加支前，有力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特别是战场周边的宿迁、宿北、沭阳、郯城等县的人民群众，克服诸多困难，不畏流血牺牲，积极投入支援前线的斗争，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据战后不完全统计，仅宿迁县就出动民工7.6万余人，支援担架3000多副，大车、牛车、土车540多辆，小船70只，门板300副，面粉40余万公斤，军鞋2.22万双，军服1500套，火草92.25万公斤。

为新中国而斗争的博士党员许包野

□ 张家芳

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迄今能考证到的第一位博士党员；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向中外学员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次临危受命，在白色恐怖中担任中共地下市委书记、省委书记，领导白区革命斗争；在狱中他受尽酷刑、遍体鳞伤，却对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满怀期待。他就是许包野，为了他所向往的新中国献出了年仅35岁的生命。

在马克思的故乡攻读博士

许包野，1900年生于泰国华侨商人家庭，7岁回到家乡广东澄海。1915年许包野成为澄海中学第一届学生，该校要求学生常思“强学即所以强国”，自此他立下报国强国的志愿。五四运动中，许包野加入澄海中学学生会，参加集会游行，宣传群众，在运动中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出路。1920年，许包野成为赴法勤工俭学公费留学生，入读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因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及中法当局停发留学生维持费，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领导留法学生发起几次大规模请愿活动，许包野积极投身其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认识到，要想拯救民族危亡，只有实行社会主义。

由于法国社会动荡、物价飞涨，1921年下半年，许包野转到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德国，入读哥廷根大学。按照德国读博士要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的要求，许包野主系选了哲学，副系选修法律和军事学，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已受到革命思想启蒙的许包野如饥似渴地研读大量哲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上苦苦探索。

1923年，许包野的人生道路由于另一位留学生朱德的到来发生了

重要转折。朱德已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次留学哥廷根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中国留德学生中发展革命力量。这一年，经朱德介绍，许包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一名先锋战士。1925年6月，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德国，许包野投入中共旅欧支部发起的声援运动。6月19日，因参加德共在柏林组织的声援集会，许包野和朱德等20多人被捕，迫于舆论压力，柏林当局3天后释放了学生。但不久，许包野被驱逐出德国，他来到奥地利维也纳继续学习哲学。

在苏联执教播撒革命火种

1926年，组织安排许包野到苏联莫斯科任教。当时莫斯科有两所特殊的培养革命人才的政治学校：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学校的课程除了语言、军事、历史之外，还开设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由于许包野在法、德、奥等国留学多年，并已在大学修读了近5年的哲学博士课程，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经过短暂的语言学习后，他就承担了东方大学的教学任务，后来又在中山大学任教，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许包野很快适应了教学需要，他的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受到普遍好评。其间，国内外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许包野按照党组织指示，团结教育广大学员，经受住了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许包野在莫斯科任教5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如1932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黄励、宣传部部长的陈原道等，都是他的学生。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许包野在学习、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在学习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学校开设的“苏维埃法制与国家建设”等课程，常使许包野陷入对未来新中

国的畅想，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日解放、早日强大起来。

临危受命领导白区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受共产国际派遣，许包野秘密回国，于1931年底回到家乡澄海与亲人相聚。得知弟弟已参加革命，他在家仅住了10天便辞别母亲和妻子，辗转在厦门找到同是共产党员的弟弟许依华。

在厦门工作期间，许包野接到指示要他到中央任职。但此时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遭受重大破坏，市委书记王海萍等牺牲，许依华接任书记又遭逮捕。1932年10月，中央任命许包野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在极其复杂严酷的环境中，许包野领导市委恢复和发展了惠安、泉州、漳州等地的党组织；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支持义勇军抗战；组建失业工人委员会，指导工人罢工取得加薪斗争的胜利；动员工人、失业者、农民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福建事变后，加强反蒋抗日宣传，争取了一批工人、医生，连同药品送往苏区；出版《发动机》《舰》《战斗》《舵》《实话报》等刊物，引导党员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许包野却充满信心，动情地向同志们描绘未来新中国的图景，“革命胜利之后，我们的经济、文化发展一定会比英法这些国家更快。”并一再号召工农群众为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

1934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遭严重破坏，中央调许包野任江苏委书记。此前，江苏省委已多次遭受毁灭性破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曾担任省委书记的陈延年、赵世炎、罗登贤、邓中夏相继牺牲。许包野毫不畏惧，赶往上海赴任，他化名“保尔”，恢复和重建了江苏省委机关。一些领导干部陆续被捕，上海临时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